

新时期以来东北女作家 小说创作的文化考察

刘颖慧 ■ 著

新时期以来东北女作家 小说创作的文化考察

刘颖慧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以来东北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化考察 / 刘颖慧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161-9089-0

I. ①新… II. ①刘… III. ①女作家—小说创作—文化研究—东北地区—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4167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琪

责任校对 胡新芳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75

插 页 2

字 数 270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言 作为一种特殊视域的文化研究	(1)
一 文学研究的文化视域	(3)
二 女性文学研究的文化考察	(16)
三 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的定位思考	(21)
第一章 新时期以来东北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化场域	(26)
第一节 多元文化建构下的时代写作	(27)
一 精英立场的文学转型	(28)
二 市场机制的大众消费	(32)
三 回归现实的底层写作	(34)
第二节 民族、边地与宗教作用下的东北风情	(36)
一 迁徙促成的民族融合	(37)
二 边地造就的文化滞后	(39)
三 萨满传奇的宗教观念	(41)
第三节 女性文学话语流变中的价值重塑	(43)
一 现代女性文学关于国家与自身命运的思考	(43)
二 当代女性文学的断裂与成长	(46)
三 东北女性文学的承袭与发展	(49)
第二章 新时期以来东北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时间场域	(52)
第一节 民族危难中的执着抗争	(54)
一 流亡东北作家表达的苦痛	(55)
二 沦陷区作家书写的压抑	(74)

第二节 性别隐匿的花木兰境遇	(82)
一 身份模糊下的性征掩盖	(83)
二 政治统辖中的艰难喘息	(97)
第三节 浮出历史地表的集体狂欢	(105)
一 女性知识分子的命运诉说	(106)
二 底层乡村女性的苦痛叹息	(124)
 第三章 新时期以来东北女作家小说创作的空间场域	(130)
第一节 地点与边界的文化思考	(131)
一 地点文化符号中的群体性格	(133)
二 民族边界中抽离出的民族身份	(136)
三 文学实践隐含的地域重塑	(139)
第二节 东北地域文化的空间指征	(148)
一 自然空间中的文化坚韧	(149)
二 民族空间中的文化共融	(155)
三 精神空间中的文化张力	(165)
第三节 独特地域空间中的东北女作家小说创作	(172)
一 土地意象与乡土精神传承	(173)
二 渔猎文明与英雄传奇	(183)
三 民族驳杂与民间方言	(190)
 第四章 新时期以来东北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性别场域	(202)
第一节 性别、女性与写作	(204)
一 社会性别阐释与性别叙事的突围	(205)
二 女性主义源起和女性写作的发生	(211)
三 性别写作、无性别写作与超性别 写作的概念梳理	(218)
第二节 群体性自觉的创作取向与机理	(223)
一 叙事主题：女性自我的觉醒	(224)
二 叙事视角：强烈的社会关注	(229)
三 叙事风格：独立的话语语言说	(243)

第三节 东北女作家性别场域中的个性书写	(255)
一 “北极村童话”：温情回望中的女性记忆	(256)
二 “歇马山庄的女人”：乡村与底层的女性关注	(260)
三 “性情男女”：都市舞台上的女性之痛	(271)
四 “作女”：战胜自我的女性与未来	(277)
 结语 东北女作家小说创作的定位、评价	(285)
一 多元文化价值观念下凝聚成整体的缘由	(285)
二 三重场域中不平衡状态下的个性显现	(287)
 参考文献	(289)
 跋	(292)

导言 作为一种特殊视域的文化研究

文学作品的产生必然要伴随着文学阅读，并进一步产生文学研究，文学研究一直伴随着文学的发展而存在，其方法多种多样。西方现代批评理论中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心理分析、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以及中国现代的意境论、节奏论、象征论、阶级论、语言论、人格论、印象论等，都是文学研究历史进程中重要的批评方式。然而随着中国不断地融入到世界文化之中，全球化的背景在各个领域均体现得十分明显，当代社会生活已然渗透到每个人的实际生活中。人们对文化产品的关注似乎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强烈，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在此时被“颠覆”，只因其并不能完全满足现有的文学生产机制。我们似乎更需要一种能够打破学科界限、将多种学科交叉、使多种理论融合的研究方式，文化研究也就自然应运而生。文化研究产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然而真正兴起却是在 90 年代，作为一种傲然屹立于中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群体中的研究方式，它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文学研究方法，它代表着文学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里，各个学科之间可以交叉共融，可以相互重叠，却丝毫不见“违和感”，这在以前的研究过程中似乎从未有过。

文化研究既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发展阶段或者一种研究方法，便与文学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自文化研究伊始，创立和从事文化研究的研究者本身就是文学批评家，如威廉姆斯（R. H. Williams）、霍尔（S. Hall）、霍加特（R. Hoggart）、汤林森（John Tomlinson）等都是重要的文学批评家。文化研究便成为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然出现的方式方

法。在全球化背景下，当文学不再是唯一的文本阅读形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当多种文化样式不断地充斥着我们的视觉神经时，文化研究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当下最“时尚”似乎也是最“便利”的研究方式。

如何定义当下的文学作品范围，这似乎也是文化研究者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新鲜的文化方式不断涌现，大众文化、网络文学、城市文化、影视文化、视觉文化等纷纷占据着受众的生活。文学与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文学的定义也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变的。比如埃斯卡皮（R. Escarpit）在《文学社会学》中提出：

只要能让人们得到消遣，引起幻想，或者相反，引起沉思，使人们得到陶冶情操，那么，任何一篇写出来的东西都可以变成文学作品。G. K. 切斯特顿甚至指出：火车时刻表也有文学用途。^①

乔纳森·卡勒（Jonathan D. Culler）的观点更为极端：

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来裁决，认为可以算作文学的任何作品。^②

“由此可见，文化研究在起源时就与文学研究关系‘暧昧’。”^③文学与文化的相通之处自不必言说，但文学毕竟不等同于文化，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必然并不相同。“只是看到文化研究与文学社会学的相似之处，甚至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是具有误导性的。”^④

^① [法] 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转引自 Eduardo de la Fuente 《社会学与美学》，《欧洲社会理论杂志》2000 年 5 月号。

^② [英] 费塞斯通：《消费主义与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98 页。

^③ 陶东风：《文化研究精粹读本》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 页。

^④ 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学的学科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

文化研究并不仅仅只是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的范围极其广泛，诸如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哲学、美学、传播学、文献学、民族学、宗教学等都属于文化研究的范畴。文化研究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的研究，而是一种大的文化视野下的研究理论。它的出现是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层面极大丰富的产物。

人们当然可以说，文学即是文化的一个部分，文学研究即是文化研究之一种。批评家们跨出了封闭的文本而来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之上。然而，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毋宁说文化研究是将整个世界看成了一个需要分析的大型文本。^①

与传统文学研究多关注精英文学不同的是，文化研究最多关注的是大众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跨学科性。首先文化研究不只局限于文本，这是其丰富性的体现。从影视到广告，从通俗歌曲到娱乐节目，几乎一切当下流行的元素都可进入文化研究的视域与范畴。越是曾经被精英文化所排斥和抵制的亚文化，越是会成为文化研究的“座上宾”。其次，文化研究体现出较强的学科跨度，多种学科的交织与融汇成为文化研究的“营养汲取地”，使其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内涵。

因此，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犹如两个相互交织的圆形，它们有交集，却各有侧重。以文化研究的方式进入文学研究领域，文学便不再是被置于殿堂之上的“贵宾”，不再那么遥不可及。文学开始走下“神坛”，在大众文化背景下，呈现出新的风貌。而文学也以更为深入的方式融入普通受众生活，从而产生更多的影响力。

一 文学研究的文化视域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文化的定义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

^① 南帆：《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参见金元浦主编《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术、教育、科学等。而在当代话语中，文化则有多重含义。除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内涵外，文化既可以指戏剧作品，也可以指卡通读物，既可以指服装设计，也可以指酒吧歌曲，文化遍布于生活的各个角落。

文化研究则是一种新的研究文化的方法，1950年以来从传统的英国文学学科中逐渐发展起来。如霍加特曾在20世纪60年代创办了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进行了一系列与传统文学研究迥然不同的文化考察。80年代初期，文化研究逐渐扩散到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美国学者的介入，改写了英国学者的研究思路，并使文化研究朝全球性的方向发展。

如何定义文化研究，这一直是研究者们争相讨论的话题。柯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认为界定文化研究十分艰难，几乎不可能实现。

在任何精确地程度上界定文化研究都是极其困难的。给文化研究画一条清晰的线索或说我们从一个侧面发现文化研究的适当领域是不可能的，指出足以标志文化研究之特征的整齐划一的理论或方法也是不可能的。由来自文学批评、社会学、历史、媒介研究等的观念、方法和关系组成的地地道道的大杂烩，都在文化研究的方便的标签下杂糅在一起。^①

格罗斯伯格（L. Grossberg）等人编选的论文集《文化研究》导言中声称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包括以下方面：

文化研究自身的历史、性别问题、民族性与民族认同问题、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种族问题、大众文化问题、身份政治学、美学政治学、文化机构、文化政策、学科政治学、话语与文本性、重读历史、后现代时期的全球文化等。^②

^① Colin Sparks, “The Evaluation of Cultural Studies, see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ed. by John Storey, First Published in England in 1996 by Arnold, p. 15.

^② [美]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Routledge, 1992），导言。

格罗斯伯格还指出传统的界定学科的方式并不适用于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只能部分地通过此类研究旨趣的范围加以识别，因为没有任何图表排列能够硬性地限定文化研究未来的主题。^①

澳大利亚学者杜灵（S. During）则明确指出：

文化研究是正在不断流行起来的研究领域，但是它不是与其他学科相似的学院式学科，它既不拥有明确界定的方法论，也没有清楚划定的研究领域。^②

一直以来，关于文化研究的热潮不减，但对于其含义却始终未能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霍加特在创建伯明翰中心时就强调：文化研究没有固定的学科基础。这一点使得文化研究老是在各种学科之间游荡，而自己则不能、且拒绝成为一门学科。”^③

著名文化理论家霍尔（S. Hall）则认为：

在福科的意义上说，文化研究是一种话语的形构（discursive formation），它并没有什么单一的起源，虽然当它最初以文化研究命名时，我们中的一些人持有某种立场。在我看来，文化研究从中产生的许多工作已经存在于别人的工作中……文化研究拥有多种话语，以及诸多不同的历史，它是由多种形构组成的系统；它包含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工作，它永远是一个由变化不定的形构组成的系统。它有许多轨迹，许多人都曾经并正在通过不同的轨迹进入文化研究；它是由一系列不同的方

^① [美] 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Routledge, 1992），导言。

^② [澳] 杜灵编：《文化研究读本》（*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New York, 1993），导言。

^③ 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理论与中国语境》，《文艺研究》1998年第3期。

法与理论立场建构的，所有这些立场都处于论争中。^①

的确，想给文化研究一个限定性的含义并不是一件易事，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当下性与大众性决定了其在学科之间的一种游离与不可定位。跨学科性是文化研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特征。跨学科也可称为“穿越学科边界”^②，即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走入学科的交叉点，从而进入问题的研究。因此，文化研究一直被称为是“反学科”或是“后学科”。从语言学到心理学，从历史学到政治学，从人类学到社会学，文化研究一直占据多个领域，且“居无定所”。“任何方法都没有什么特权，但同时，也不能排除任何方法”^③。传统的文学研究的方式早已不再适应新的文化研究，因此，也就无法给予文化研究确定的界限。正如杰姆逊（Fredric R. Jameson）所说：

文化研究可谓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最好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入手，将它视为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④

给予文化研究一个精准的定位，已是不可实现。若是真正定位的研究，也就不再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独立于各种学科门类之间，却又与各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许这正是文化研究的独特性。文化研究侧重的是一种“关系”的研究，这与传统的学术研

^① [美]霍尔：《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参见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Routledge，1992），第278页。

^② Elaine Baldwin (et al.)，*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London：Prentice Hall Europe，1999，p. 3.

^③ [美]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Routledge，1992），第3页。另一——凡于文中多次引用同一版本文献，只于第一次引用时标注版本，以后引用仅标注卷、集、页码，不再赘标版本；多次引用同一文章，也只于第一次引用时标注发表刊物名称及时间，以后引用只标注文章名称，不再赘标刊物名称及时间等。

^④ [美]杰姆逊：《论“文化研究”》，《社会文本》杂志第34期，杜克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译文见王逢振等译《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9页。

究大不相同。传统所关注的是群体、精英和高雅，文化研究则关注个体、大众和世俗。

文化研究的另一重要特征是“语境化”，也可称为极度“语境化”。文化研究呈现出极其开放的形态，然而却极具历史性和地域性。这意味着当文化研究进入到本土空间环境中，必然显现出不同特点。格罗斯伯格曾说，“对于文化研究来说，语境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语境”^①。这种说法固然极端，却道出语境化对于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特纳（Graeme Turner）在对比英美两国大众文化时指出：

对于观众的重新发现，对于观众所使用的反抗策略的重新发现，在大众文化的定义中求助于此类策略——这在英国的文化研究内部一直都是重要的、正确的发展。但是当它们进口到美国，就进入到了另一个语境中，在这个语境中，大众的观念在支配性的文化界定中占据一个非常不同的位置。这种理论进口似乎已经加剧了由对于观众的新的解释导致的文化乐观主义的扩张——说到底，这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对于反抗的宽容的乐观主义。^②

特纳的总结道出了大众文化在英美两国的不同凡响，当文化进入不同地域视野中时，无法脱离语境的影响，因此文化的“出口”并不等于“拿来主义”，这种“拿来”仍然带有一定程度的取舍，这种取舍恰恰是由不同文化语境造成的。

当下性同样是文化研究的另一重要特点。文化研究多针对的是当下的社会现实，其关注点也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20世纪80年代，文化研究率先在英国文学中产生便是当下性的体现，当时英国

^① L. Grossberg, “Cultural Studies, Modern Logic and the Theory of Globalization”, *Back to Reality? Social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Studies*, ed. by Angela McRoddi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8.

^② [美] 斯拉里、惠特：《伦理学与文化研究》（*Ethics and Cultural Studies*），参见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第573页。

最严重的现实问题是阶级与亚文化，文化研究也就借此契机应运而生。80年代，当美国被种族问题、殖民主义、妇女问题等困扰时，文化研究也迅速地转换了它的“视角”。格罗斯伯格说：

文化研究总是在断裂和游走中向前推进的，不断地拼力重新安排和重新界定工作平台本身的理论差异，以回应特定的历史问题和事件。因此，它总是迈上自己行将放弃的平台，而被放弃了的平台将被它重新占领。^①

文化研究还具有大众性，虽然文化研究不能被简单地称之为大众文化研究，但大众文化研究绝对是文化研究的主体，并处于中心位置。被精英文化“不屑一顾”甚至是“嗤之以鼻”的各类文化现象，都可进入大众文化研究的视野。文化研究真正进入到一个平民的研究视野，传统的精英文学被大众文化所取代，从前的文学经典被重新解读，诸多文学大师也纷纷走下“神坛”，与大众读物争抢出版传媒的阵地。文化研究带来的似乎是文学与文化上的“颠覆”，它颠覆了传统文学的地位，颠覆了文化的单一性，但却给文学与文化研究带来了一个新的研究视域。

从来没有过如此之多的关于莎士比亚的论文。人们从任何一个可以想像得出的角度研究莎士比亚。用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分析学的、历史的以及解构主义的词汇去解读莎士比亚。^②

而大众文化研究一直在致力于关注地域的、民族的、底层的、边缘的文化范畴，并表现出一定的批判性。

^① [美] 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流通》，马海良译，载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② [美]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文化研究就发展出了一种尝试重新发现与评价被忽视边缘群体的文化的研究机制。由此决定了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它坚持审美现代性的批判意识和分析方式，不追逐所谓永恒，中立的形而上价值关怀，相反它更关注充满压抑、压迫和对立的生活实践，关注现实语境，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制度形态进行了严肃的不妥协的批判。^①

文化研究的批判性还集中表现在阶级、种族、性别等方面，这正是社会中最不平衡的几个侧面，因此上述问题自然就成为文化研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文化研究一直致力于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利益，权利不平衡之下的被动势力争取更大的权益。

文化研究为被剥夺者辩护，代表那些屈从的、沉默的、被支配的、受压迫的和遭到歧视的个人与群体的声音。它的言说不只为了“这里”的人们，而是为了“那里”的人们，即为那些在统治性话语中没有声音的人们和在统治性政治与经济等级中没有地位的人们说话。^②

因此，文化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发端于 20 世纪 50 年代，兴盛于 90 年代，以阶级、种族、性别为核心研究范畴，涉及文学、哲学、美学、传播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亚文化、视觉文化等多个文化领域，但又不偏重于某个领域。其核心特征为跨学科性，同时还具有语境化、当下性、大众性、批判性的特征。文化研究与各个学科相互交织却又互相独立，其出现为文学研究乃至其余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带来了冲击与颠覆，并极大地丰富了研究进程。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世界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发展程度的

^① 金元浦：《定义大众文化》，《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② J. D. Slary and L. A. Whitt, “Ethics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Lawrence Grossberg, Cary Nelson and Paula A. Treichler (eds.),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573.

不平衡，直接导致人类在收入、财富、待遇等方面上的不平等，且这种不平等似乎出现愈演愈烈的趋势。而物质上的不平衡更加导致在精神上的不平等，人们不能在一个比较平等的基础上接受教育、享受权利。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促使其文化更是呈现出极大的不平等性。作为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权力一直成为文化研究者喜欢探讨的话题。正如福柯所说，“权力无所不在；不是因为它包含一切事物，而是因为它来自所有地方”^①。

关于权力，马克思的观点影响深远。马克思本身并不从事文化研究，但其关于阶级、意识形态等的理论极好地诠释了权力的概念。马克思认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相互敌对的社会阶级。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资产阶级由于其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操控性使其在文化上也占据了优势地位。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名论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也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②。因此，文化上的不平等性得以一直存在。而阶级、种族与性别则是文化上不平等的主要根源，也因此构成了文化研究的三个主要视角。

阶级的不同直接产生了文化差异，生活在不同阶层的人们在物质与精神领域的不同待遇是导致他们文化不同的主要原因。正如近年来兴起的亚文化研究，穷人所经历的贫困的生活方式，直接导致文化上的差异，并反映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对“剥夺循环”的探讨，更加使贫穷家庭所可能面临的境遇展现出来。

如图 0—1 所示，不称职的父母所培养出的孩子最后仍将走上不称职父母之路，这似乎是一个“怪圈”，但却是贫穷阶级所难以走出的文化怪圈。父母身上所经历的可能终将成为他们孩子的未来，

^① [英] 阿雷恩·鲍尔德温：《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7 页。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8 页。

阶级所带来的文化差异以及文化差异对于阶级的影响不言自明。进行文化研究，不能忽视对阶级的关注，无论出身于哪个阶层，终将会受到其阶层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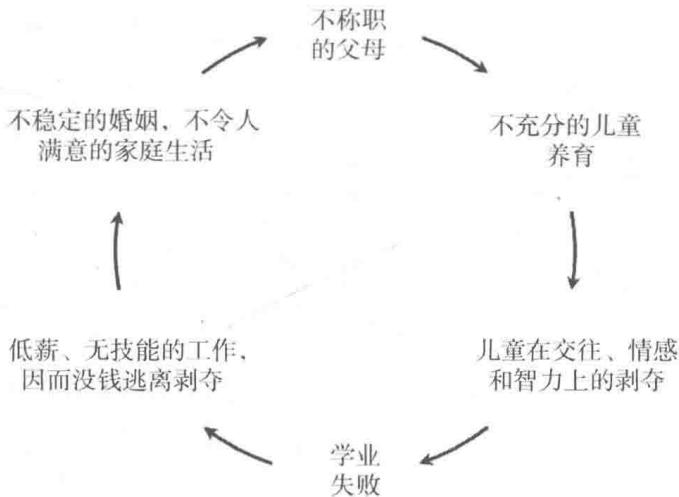


图 0—1 剥夺循环^①

种族则是文化研究的又一重视角，当人类被分为白人、黑人、黄种人，当人类被分为本土民、移民，当人类被分为不同的民族，身份与文化上的差异也就一直存在。也许一直以来，在个别种族的问题上，就存在着某种偏见。对于孩子们而言，黑皮肤与白皮肤从小就存在着差异，黑人儿童在学校很难享有和白人儿童同样的权益。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移民与少数民族，对移民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忽视在文化史上早已有之，它们常常被当作边缘文化而忽略不计，便好似从未存在过一样。然而，文化研究从未忽视对边缘文化的考察，因种族问题可能被忽视的文化都在文化研究的范畴之内，对种族问题的探讨同样是文化研究的重要视角。

性别也常作为文化研究的视角而存在，也许自人类存在以来，

^① [英] 阿雷恩·鲍尔德温：《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